

根留本土依江润 叶起寒棱映月开

——忆郑杭生先生

他们这一代社会学家最强烈的人生理想就是，在参与推动国家发展进步的进程中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

□ 王道勇

郑杭生先生是新时期中国社会学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的的一面旗帜。作为一名社会学家和教育家，他的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等理论创新和学术观点已经在社会学及相关学科中广为人知。

记得梁漱溟先生论及世界文明时曾经说过，人类存在三种主要的文明形式，即西方文明、儒家文明和印度文明。其中，西方文明主要是在处理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向外用力为主；儒家文明主要是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以追求人际和谐为主；印度文明主要是在处理人与内心的关系，以向内用力为主。我想，其实任何一个思想者也都在同时处理人与外部世界、人与人、人与内心的关系，并且因为处理得法，产生的学术思想才会广为传播、泽被后世。在这三个方面，郑杭生先生都使我印象深刻、受益终生。

“爱国为民”的家国情怀

从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角度来看，与费孝通先生等老一辈社会学家一样，经世致用、报国为民一直是郑杭生先生一生最大的学术追求。新中国成立之际，郑杭生先生正在中学读书，他亲身经历了解放以前旧中国的衰落挨打、改革开放以前30年新中国的大变动，以及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中国的大发展大复兴，那种对民族、国家发展的自豪感和对人民的责任感，是与生俱来的，并且深嵌于他的生活和学术研究之中。他们这一代社会学家最强烈的人生理想就是，在参与推动国家发展进步的进程中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日常生活中，郑杭生先生言行之中无意间所展现的那种强烈的“家国情怀”，对人极具感染力。

最初有这种强烈感受的是在我博士即将毕业之际。记得有一次我去他办公室请教博士毕业论文写作中的问题，同时也提及我毕业后的去向，郑先生听后鼓励我留在高校工作。当时我的回答是：“留在高校，影响学生，是影响中国的未来；留在党校，影响干部，是影响中国的现在。郑老师，我想影响中国的现在！”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是汗颜至极，但当时郑老师不仅没有责怪我的狂妄，反而很高兴地点了点头，表示很认可。后来我慢慢地明白，他不责怪我可能是因为报国一直是他为学为人的最重要价值取向。

在为学之道上，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学学科的领军人物和思想者，郑杭生先生的这种家国情怀表现得最为突出。在中国社会学学科的价值定位上，他为社会学提出了两句名言——“增进社会进步，减缩社



会代价”。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方向上，基于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深深自信和热爱，他很早就提倡要有“理论自觉”，对西方社会学不能亦步亦趋，要建设社会学的中国学派，要当仁不让地成为世界社会学的东方中心。在他个人的学术取向上，有一次我曾幼稚地问他我是左派还是右派，郑老师很认真地回应说，“左派觉得我是右派，右派觉得我是左派，其实我是不左不右任我行”。其实他是在告诉我，做理论研究、分析中国现实问题，都要公平持中，不走极端。在个人的理论创新上，他一生提出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学本土论、社会互构论等成型的社会学理论，这些理论无不是立足于传统文化，无不是对快速发展中的中国社会进行的高度概括与理论升华。

在郑先生人生的最后几个月，我们还能真切地感受到他这种深切的爱国为民之情。郑先生过世后，我曾对他人生最后半年原创和转发的所有微信内容进行过整理。在微信中，郑先生那种深沉的家国情怀一览无余。从2014年5月6日到11月6日共半年186天里，郑老师共转发微信308条。内容主要涉及“人生思考”“国家大事”“社会问题”和“学术研究”等领域。其中关注焦点有中日关系、“占中”运动、西方民主评述、批判达赖、中国的发展成就及相关研究等。仔细研读他所写和转发的内容，可以看到郑先生深爱着国家和民族，他原创或转发的微信大多是对中国问题进行的理性分析和积极引导，而非简单的情绪发泄。可以说，他不是激进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是一位理性的、热情的爱国主义者。

“宽厚仁善”的待人之心

在以儒家文化为根本的中华文化氛围下，如何处理好“人—己”关系，是一门人生大学问。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郑杭生先生一直秉持着“宽厚仁善”的待人之心。

对于弟子，郑先生的“宽厚”之心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前不久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我与同门杨发祥、黄家亮等聊起郑先生，大家都一个共同的强烈感受：郑

先生对学生极其宽厚。他收的弟子来源五湖四海，每个人有优点有不足，但他却能够看到每位弟子身上的最大亮点所在，并且会经常提及和加以勉励。记得我刚到中央党校教书时还不到30岁，但每次与郑先生小聚、开会或者进行社会调研时，一旦有外来的专家学者在场，他都会很热情地把我介绍给别人：“这是王道勇，很年轻，不得了的，现在就已经给省部级干部讲课了！”虽然只是片言只语，但对后辈的宽容之情和提携之意却溢于言表。在他人生最后的十多年间，郑先生无数次地在生活上帮助我、在学术上指引我。深受师恩的我，唯一一次回报他的就是在他病重住院时给他刮了一次胡子。当时，心情沉重的我刮得并不好，但他看后却很满意地说：“刮得很不错嘛！”

不仅对自己的学生，郑先生对所有的年轻人都有宽厚之心。郑先生晚年付出心血最多的一件事情就是创办了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按郑先生自己的说法，这个基金会所需资助资金是他一个个体化缘而来，其中的艰难、辛酸和喜悦，真是一言难尽。仅3年多的时间里，基金会就为全国大学、社科院和党校等研究系统的154位社会学专业硕士生、博士生及青年学者的学术研究工作进行无偿资助，前后捐资数百万元。每次面对大量的申请书，他都认真参与审阅，而且在资助过程中注意向来自贫困地区、民族院校和一般高校的学生倾斜。

对于社会，郑先生秉承着传统中国人的“仁善”之心，并且尽力付诸实践。基金会以促进社会发展为方向，在资助硕士博士的同时，每年还将数十万元善款对贫困地区进行定向捐助，帮助贫困地区的人民渡过生活难关，赢得发展机会。除了基金会，他也以自身的学识最大限度地服务社会。他年纪大些后，很多人劝他尽量少去外地尤其是比较偏远的地区，他说：“这些地区联系我，就是对我的最大信任。”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无论是大都市还是最偏远的乡村，无论是著名大学还是一般院校，只要邀约他去讲学或者调研，只要校内没有课，郑先生就一定欣然前往，并且每次他事先都会很认

真地进行思考和准备。每次讲课、讲话他都会讲出一些新思想新观点，每到单位或社区他都会提出一些很有见地的意见建议。就在前一段时间，中央党校第8期县委书记培训班结束后，山西阳泉城区区委书记张晋同志送给我一本当地《社区志》，并说当地的社区工作做得很好，这可能是全国第一部县级社区志。拿着书我马上想到，郑老师就曾经多次去过这个地区调研，这部厚重的《社区志》中也凝聚着他的一份心血。

“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

如何生存、如何看待死亡是思想者思考最多的问题。柏拉图、尼采等人甚至极端地认为，人生就是一个练习死亡的过程。《周易·系辞上》指出，“乐天知命，故不忧”。孔颖达的解释是，“顺天道之常数，知性命之始终，任自然之理，故不忧也”。可以说，在处理人与内心的关系方面，郑杭生先生那种“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令人印象深刻。

一方面是“乐天”，郑先生的人生态度非常积极，生活得异常精彩。他与师母宫老师的一生恩爱一直让学生们羡慕不已；他是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最早穿西服的教师之一；他是最早熟练操作使用苹果平板电脑的人之一；在微信流行之际，他也整天利用微信进行交流，在多个微信群里很活跃，甚至取了一个微信昵称叫“70后老郑”。生活中，郑先生说自己一生都是逢山必登，年近八旬之际还带着几个学生登上华山，并且很高兴地题词自贺一下。上课时，一头黑发的他经常让学生们猜他的年龄，学生们的猜测总是出错，每当此时他就会很得意地给出答案：“我是远看五十岁，近看六十岁，仔细一看七十多岁，干起活来像四十几岁！”所以我们这些弟子总说，郑先生没有晚年，因为他从来没有老过。

另一方面是“知命”，郑先生对待生死的从容之态尤其令人动容。罹患绝症的他，一直一边治疗一边工作。在死亡的边缘上，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怨天尤人；他是一直到最后实在吃不下饭了，才提着电脑包去住院，而且住院的当天上午还出席了一个交流会议，四天后即撒手人寰。郑先生在医院做完手术后，我去值班陪他，他疼得厉害，但却一直在无声地扛着；虽然躺在床上难以动弹，但还是惦记着要把我们合写的一本书的样书给我。可以说，郑先生用人生的最后几个月给我上了最后一堂也是最重要的一堂人生大课！

郑先生走了，他的一些学术观点还没有提完，他的一些学术愿景还没有实现，但是他已经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那种“爱国为民、宽厚仁善、乐天知命”的人生境界。这也是郑先生以及那一代学术大师们留给我们的共同财富。

学术人物

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 陈 甬

理论研究领域，孙本文的代表著作《社会学原理》基本上归纳了当时中国学界对社会学理论的主流观点，涉及文化、社会态度、社会行为、社会学的分类等等诸多理论层面，是国内这一时期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成果。1947年，费孝通出版其在云南大学教学时的讲稿《乡土中国》，对中国本土社会的文化、人际关系与社会结构进行了理论的思考，其中关于“差序格局”的论述成为中国社会学本土理论中影响力最为深远的理论之一。

1979年，中国社会学复建以来，与世界社会学中断交流几十年的国内社会学理论界，又重新经历了引入西方社会学理论，发展中国本土理论的艰辛历程。复建早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者，主要工作就是大量引入、翻译、研究、评价西方的社会学理论成果，用以指导中国社会学的经验研究。这一时期，大量成果集中在对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西方社会学经典人物的著作翻译和理论解释上。

本土理论创新的尝试

长久以来，中国社会学界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界都存在着西方理论和话语体系占据主导地位，基于中国本土理论渊源和本土实践的理论发展困难的问题。在西方理论和研究方法占主流的情况下，社会学研究逐渐成为采用西方学者理论解释中国现实的研究。诚然，部分西方理论固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也有部分学

者在引入的过程中针对中国实际进行了改造，但是这种中国本土理论弱势的局面一直是众多社会学理论研究者的心中之痛。

除了单纯的阐释西方学者的理论外，近年来，社会学理论界也在不断尝试着理论创新和理论建构，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

2004年，费孝通先生在前最后一篇论文中，提出把“心”等中国特色概念引入到社会学研究之中，希望打破西方社会学实证主义的束缚，扩展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传统界限。占据西方社会学研究主流的实证主义社会学，以自然科学为范本，强调社会学的客观性、规律性和可证伪性。对实证主义的过度强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学本土理论的发展。

在社会学本土理论的建构过程中，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学者的工作对大陆学者也有所启发。叶启政、阮新邦等学者在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中，重新融入了中国传统的思想，将东西方思想进行融合。黄光国、杨国枢在关于中国人独特心理、中国的人际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也影响了大陆的众多研究者。

从20世纪末到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学者更多从中国社会的独特经验出发，发展本土社会学理论。其中，孙立平对中国社会的宏观发展进行了展望和描述，提出了“社会转型理论”“社会断裂论”“社会博弈论”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吴忠民则根据中国社会学的基本现状，提出了不同于西方理论的“社会公正论”和“社会矛盾论”。谢立中综合了后现代

社会理论思潮，提出“多元话语分析理论”。刘少杰根据中国社会底层民众的行为特点，提出“感性选择理论”。郑杭生关于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建构则更加系统，先后提出“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学本土论”和“社会互构论”等四论，尝试建构与西方社会学相互对话又有所区别的本土社会学理论。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并不仅仅是单纯逻辑上的理论推演产物，中国社会学领域在经验研究层面上的成果，也在不断支撑着中国社会学理论界的理论发展。例如关于中国社会的市场转型、社会分层、单位制、城市社区治理、乡村社会、市场秩序等领域的研究等等。

依然艰巨的任务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立足中国经验、根植中国本土思想的社会学理论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的理想。从康有为、梁启超到今天中国众多科研工作者，都试图努力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在西方文明和西方话语体系占据主流的全球社会科学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涉及社会科学从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到研究背后的哲学基础等诸多深层的问题。仅就中国社会学理论本土化道路来看，这百余年历程中尚有重要的理论任务仍未完全实现。

首先，中国本土的传统理论资源如何融入到中国社会学的理论中。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思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提出过“钟摆理论”，说人生总是在得不到的“痛苦”和得到之后的“无趣”之间摆动。应该说，叔本华的“钟摆理论”有一定道理。我们很多人或许都有过这样的体验：自己的目标没有实现时，会焦虑不安、痛苦不已。而一旦目标实现，又会出现“边际效应”，幸福感便会逐渐减弱，以至于某一天觉得自己追求的东西“不过如此”，这其实就是陷入叔本华所言的“无趣一端”。

但叔本华说，还是有极少数人能够超越“钟摆理论”，这极少数的人是艺术家“之类”。艺术家们钟情于艺术、热爱艺术，在对艺术的钟情和热爱当中享受过程的快乐和结果的快乐，他们视自己的艺术作品为至宝，视自己的艺术作品为生命，视自己的艺术作品为孩子。

究竟还有哪些人可以超越叔本华的“钟摆理论”？我以为除了艺术家之外，还有不少人。只要是钟情或热爱某一事项，抑或痴迷于某一事项，把它当作习惯、当作爱好、当作生命中的组成部分，这些人无疑都可以超越叔本华的“钟摆理论”。一些人热爱运动，在运动当中享受快乐；一些人热爱慈善，把慈善当作事业，在慈善事业当中享受满足。通常职业生涯中，一般有三种态度：一种是把职业当副业，一种是把职业当工作，一种是把职业当事业，而把职业当事业追求者，往往会很快乐，并且能够做出成就来。

真正的学者就可以超越叔本华的“钟摆理论”，他们把学术当作人生不可或缺的部分，在阅读、思考和写作过程当中享受人生快乐。法国社会学家希亚说，在饱览了传世之作、邂逅绝代佳人、游历至纯至美的沙漠之后，你告诉自己，人生不过如此。但事实上还会出现另外的东西——另一本书、另一片沙漠。即是说，还可以在另一番“领地”找到人生的快乐。

学术人生可以超越叔本华的“钟摆理论”，但学术人生到底需要什么品质？我以为至少包括几个方面：一是不为功名而“学术”。如果把学术当作捞取功名的手段，其学问就很难说是真学问。真正的学问是超越名利的，所以，学术不是物质奖励出来的。物质奖励不过是让学生生活得更“尊严”一点。二是不为学术所累。或许在外人看来，一个人沉溺于学术当中，广泛阅读、深入思考、长期伏案，一篇又一篇论文的发表，一本又一本著作的出版，一个又一个观点的提出，把整个生命都耗在这里，活得很累、很辛苦。但是，于学者本人而言，却是快乐的。这种精神上的满足胜过许多物质上的愉悦。从一定意义上讲，物质上的快乐是短暂的，精神上的快乐却是持久的。三是有学术天分。学术需要天分，就像艺术需要天分一样，没有天分终难取得大的成就。四是需要勤奋作“养料”。勤奋是成就事业的“养料”。爱因斯坦说过：“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的目的。”亚里士多德说过：“他们活着是为了吃饭，我吃饭是为了活着。”有天分的人不勤奋，就像好的种子，却缺失好的土壤、缺失足够的阳光和水分一样。

最值得一提的是，学术人生是幸福人生。因为这世界上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职业与爱好联系在一起，不少人从事的职业并非自己“所爱”，或许仅仅只是把它当作谋生的手段。但爱好学术，并有学术天分，又把它作为自己的职业选择，这些人无疑是幸福的。

深度观察

想基础建立在西方的哲学思想之上，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而中国的社会学理论如何与中国儒、道、释的思想渊源结合，或者这些古典的中国思想已经无法无法与现代社会以及现代学科话语体系相融合？100多年前，康有为将“大同”“小康”的思想和西方社会思想进行过相融合的尝试。这种类型的尝试，能否在未来的中国社会学界占据一席之地，并且继续发展？

其次，在社会学界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实证主义研究和非实证主义研究相对分化和对立的今天，如何保证中国本土的经验能够转化成中国本土的社会理论。单纯的理论发展，往往缺少经验的支撑，而大量的经验研究结论，往往没有能够升华成为具有深度的本土理论。如果没有一种打破西方社会学学科常规与束缚的理论勇气，构建出中国自己的社会学理论；如果仅以西方的理论解释中国，再返回西方理论进行验证真伪，中国经验和中国实践存在的意义仅仅是修正或者证明西方理论的错误与否，那么中国社会也就成为西方中心主义研究下的参照物，人云亦云、亦步亦趋，从而失去了引领人类文明进程的基本能力。

对于中国社会学界的理论工作者而言，传统的皓首穷经式的解读工作是不可或缺的，是一切本土理论创新的基础。但是，未来的中国社会学界，需要社会学理论注释者的同时，也需要更多社会学理论的提出者和创新者。任何一种新理论的提出，都需要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上，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理论抱负，去面对诸多的批评与责难。对于中国社会学界而言，发展中国社会学本土理论，仍然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事业。

学术思潮